

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三版)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程光炜 刘勇 吴晓东 孔庆东 郜元宝 著

本书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显著成果之一。不仅是一部“作家作品史”，也是文学观念的发展史、社团杂志史、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史。不居高临下，与学生在“平等对话”中“重回历史现场”。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三版)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程光炜 刘勇 吴晓东 孔庆东 郜元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程光炜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0

(博雅大学堂·中国语言文学)

ISBN 978-7-301-19490-4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5685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 程光炜 刘 勇 吴晓东 孔庆东 郜元宝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490-4/I · 238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开本 26.25印张 444千字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第三版前言

今年初春,因与原出版社合同期满,经各位同仁协商,决定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为国内文史类著作出版中心之一,它在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建立的声誉,有利于本教材与广大读者的进一步交流。

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大的格局未变,作者只对它的一部分内容做了一些修改和增订。同时,编选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作为它的配套教材一并推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中,为便于学生了解现代文学作品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每篇作品后面安排了一些文字,作为简单的“延伸阅读”,目的是交代学术界30年来对于该作品的主要研究成果、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与此同时,对作品稍微做一些解读。这样可以浓缩几十年的研究状况,理出一些线索,让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能够建立起基本的知识视野;如果学生想做进一步研究,这个“延伸阅读”显然也是进入研究领域的途径之一。另外,鉴于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观和方法的不断变化,作者在修订本教材时对文学思潮、现象和流派包括作家的认识,做了一点儿修正,希望它们能够回归原初的存在状况,评价的尺度、分寸尽量平实和公正。

1999年本教材刚刚启动时,杨联芬、张泉、沈卫威等教授参与了编写工作。因考虑到人员更为紧凑集中,有利于以后的修订,他们在第二版时不再担任编写任务。本教材出版第一版时,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第二版又被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0年,它作为“大陆学者丛书”之一在台湾出版。从2000年至今,在中国大陆总共重印了十次,被数十所大学定为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参考教材。在之前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期间,责任编辑陈泽春、李颜、翟江红等老师,都为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2011年9月7日
程光炜

第二版前言

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2000年出版至今,已重印过七次,受到这门专业课的授课老师和学生的欢迎。到目前,它成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中文系重要的本科生教材和考研参考书之一。一些港台和国外的大学也把它列为教学参考书目。这次重新编写的第二版又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书的初版本,有近十所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参与编写。第二版则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五所高校的学者承担。重写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重写作家作品的分配上,仍然考虑到编写者各自的研究专长和他们在某一领域里的学术积淀,尽可能地体现其学术水准和叙述特色。因特殊原因,初版本的第一章、第二章的作者不变。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二十年来本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成果之一。在此期间,曾有《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著作出版,另有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在计划出版之中。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本身的活力和文学史观方面的变化。社会变迁和历史意识的调整,促使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资源、社团杂志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对它的“重评”,不光在一般平面上展开,而且也在多种侧面上立体地展开,以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越来越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今天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然不单纯是一部“作家作品史”,同时也是文学观念的发展史、社团杂志史、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史。在文学史重新建构的过程中,除了作家、作品和批评等传统的研究范畴,作家与都市、社团、媒体的互文关系,以及对文学与社会事件、转型之间关系的“重审”,也应该更积极和有效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看,某一文学现象的形成过程,并不只是来自“文学内部”因素的激发,同时也与文学的“外部因素”有显而易见的互文作用;某一流派的

孕育过程,除其观念、审美维度的刺激,同样受制于文学制度、出版、圈子意识等因素的诱导与推动。这都是今日的研究者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文学事实”。正由于如此,“重编”后的中国文学史,必然会对原先的思路和设计有所调整,将一些文学现象加以反思和“重评”,而对另一些“评价过高”的作家作品,则采用压缩、平实处理的方式,使其能够实现历史的“复原”,还其本来面貌。当然,一些相当复杂的文学现象、论争和纠纷,鉴于材料限制,鉴于历史成见的干扰,也鉴于当事人社会关系的存在,仍然不能做出真正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对它们的深入认识和把握,需要在更远的历史时空中经过沉淀后才能获得。本教材还认真吸收了近年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编写者本人的研究心得,这无疑有利于叙述空间的扩展,也有利于进一步呈现过去文学史较少涉及的一些问题。

本教材坚持一贯的叙述风格,即不是居高临下的叙述姿态,那种带有“教训”意味的为文风格,而是以一种与学生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展开对各种文学现象、创作和作品的细致叙述,以一种力图逼近文学史真实的态度,跟阅读者一起“重回”文学史“现场”,在掌握必要的知识的同时,获得文学的美的享受。

第二版编写的具体分工是: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绪论、第十五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章

郅元宝(复旦大学):第三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

吴晓东(北京大学):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孔庆东(北京大学):第五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二章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

孙民乐(中国人民大学):第一章、第二章

全书大纲基本未动,只对部分章节的标题和个别内容作了一些调整,目的是对历史采取一种平实的态度。在重新编写本书的过程中,郅元宝和吴晓东正在韩国、日本讲学,他们在那里写出初稿,回国后经过修改最后定稿。全书最后的注释校对、内容审定仍由程光炜负责。

目 录

第三版前言/1

第二版前言/2

绪 论/1

第一节 文学启蒙的意义/1

第二节 对启蒙的冷静反观/5

第三节 国家现代化及文学的新要求/10

第四节 现代化的中断与变异:中国现代文学前、后期的形成/13

上编 (1917—1937.6)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19

第一节 “发生”的概念/19

第二节 近代知识界的形成/21

第三节 白话的兴起/25

第四节 近代诗文界的革命/32

第二章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学/37

第一节 文学革命/37

第二节 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设/41

第三节 文学社团与创作倾向/45

第四节 早期白话文学创作/49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鲁迅/53

第一节 鲁迅出现的意义/53

第二节 《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58

第三节 《野草》和《朝花夕拾》/65

第四节 杂 文/70

目 录

- 第四章 多种小说形式的探索/79
 - 第一节 郁达夫与“自叙传”抒情小说/79
 - 第二节 “五四”时期的抒情小说/84
 - 第三节 乡土小说的流脉/88
 - 第四节 “为人生”的小说/91
- 第五章 现代散文的建立和发展/97
 - 第一节 “随感录”所开创的杂文/97
 - 第二节 周作人与美文的倡导/101
 - 第三节 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104
 - 第四节 报告文学的兴起与演变/108
- 第六章 新诗流派的多样化探寻/111
 - 第一节 “凤凰之再生”——郭沫若和《女神》/111
 - 第二节 小诗派与“湖畔诗人”/114
 - 第三节 “戴着脚镣跳舞”——新月派诗人的追求/118
 - 第四节 冯至及其他诗人/123
- 第七章 现代话剧的孕育与进展/128
 - 第一节 文明戏与爱美剧/128
 - 第二节 丁西林与早期独幕剧/131
 - 第三节 田汉、洪深与浪漫戏剧/134
 - 第四节 夏衍与戏剧民族化的努力/138
- 第八章 曹禺与现代话剧艺术/142
 - 第一节 命运悲剧——《雷雨》/144
 - 第二节 《日出》、《原野》及其他/148
 - 第三节 文明的挽歌——《北京人》/152
 - 第四节 曹禺的戏剧观及其影响/155
- 第九章 时代激流中的左翼文学/157
 - 第一节 红色年代的先锋旗帜/157
 - 第二节 激昂的左翼诗歌/163
 - 第三节 浪漫化的革命小说/169
 - 第四节 转向写实的左翼小说/172
- 第十章 现代派文学思潮/176
 - 第一节 李金发与象征派诗人/176

目 录

- 第二节 戴望舒与现代派诗人/180
- 第三节 “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幻影/186
- 第四节 现代话剧的先锋实验/189
- 第十一章 茅盾、巴金及现代长篇小说/193
 - 第一节 茅盾:冷峻理性的小说大家/193
 - 第二节 巴金:燃烧青春与生命的作家/204
 - 第三节 “大河小说”:现代长篇的新尝试/209
- 第十二章 老舍与现代市民小说/215
 - 第一节 老舍的文学史地位及创作生涯/215
 - 第二节 京味文化的缔造者/217
 - 第三节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220
 - 第四节 老舍小说的艺术成就/223
- 第十三章 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228
 - 第一节 “乡下人”与“城里人”/228
 - 第二节 用诗构筑的生命牧歌/230
 - 第三节 京派文化与京派作家/234
 - 第四节 废名的田园小说/239
- 第十四章 礼拜六派的通俗小说/242
 - 第一节 雅俗格局的演变/242
 - 第二节 一枝独秀的民初五年/244
 - 第三节 面向现代观念的调整/249
 - 第四节 与新文学比翼齐飞/254

下编 (1937.7—1949)

- 第十五章 战争时代文学的书写和选择/259
 - 第一节 战争背景下的文学思潮及论争/259
 - 第二节 文学创作的基本格局/265
- 第十六章 东北作家群及流亡文学/271
 - 第一节 东北作家群:文学与文化的双重意蕴/271
 - 第二节 萧军、萧红的创作/276
 - 第三节 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白朗等人的创作/285

目 录

- 第十七章 张爱玲、钱锺书及沦陷区作家/289
 - 第一节 张爱玲与乱世传奇/289
 - 第二节 钱锺书的《围城》/298
 - 第三节 沦陷区的文学叙述/302
- 第十八章 艾青与七月诗派/307
 - 第一节 艾青诗歌的发展/307
 - 第二节 土地的歌者/309
 - 第三节 艾青诗学的意义/311
 - 第四节 田间和七月派诗人/314
- 第十九章 穆旦与西南联大诗人群/319
 - 第一节 大时代背景下的校园诗/319
 - 第二节 穆旦:新诗现代性的冲突与整合/323
 - 第三节 联大时期的诗学与创作/328
- 第二十章 国统区的历史剧和讽刺喜剧/332
 - 第一节 《屈原》及历史剧创作/332
 - 第二节 讽刺喜剧的潮流/338
- 第二十一章 国统区的长篇小说/342
 - 第一节 40年代小说概貌/342
 - 第二节 老一代作家的创作/346
 - 第三节 路翎和七月派小说/351
 - 第四节 风采各异的新生代/354
- 第二十二章 都市通俗文学的新局面/357
 - 第一节 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357
 - 第二节 后期浪漫派:现代化的通俗小说/360
 - 第三节 武侠小说的繁荣/366
 - 第四节 其他类型的深化/369
- 第二十三章 赵树理:文学转型的一个标志/373
 - 第一节 “文艺大众化”的继续与进展/373
 - 第二节 变化的意义/380
- 第二十四章 戏剧、诗歌的新天地/383
 - 第一节 基本的发展与风貌/383
 - 第二节 《白毛女》与民族新歌剧/386

目 录

第三节 以《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为代表的叙事诗/389

第二十五章 小说和散文的创作/392

第一节 孙犁:追求诗意的抒写者/392

第二节 “土改史诗”和“新英雄传奇”:长篇小说的新视野/400

第三节 其他作家的创作/406

第二版后记/409

绪 论

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痛苦焦虑、忧患不断的历史进程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这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的基本面貌和走势,赋予它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性格。正是因为 1937 年抗战的突然爆发,一度中止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把这个有纪年含义的历史符号带入到 20 世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对文化结构和心理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似乎可以考虑作这样的调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爆发,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半期;抗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则形成了它的后半期。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以 20 世纪中国的命运为前提、为指归的,它既是社会大振荡、大阵痛和大调整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大撞击和大渗透的产物。正像社会历史转变的性质经常会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主题的延伸与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历史面貌。

第一节 文学启蒙的意义

○启蒙的历史依据 ○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 ○“现代化”内涵的扩大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从“中国中心论”的彻底破灭开始的。1840 年的鸦片战争成为这场全民族总危机的导火线,它后来又把中国带入到灾难深重的甲午战争中。民族危机感对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它在思想理论上的重要收获是严复译的《天演论》,在社会体制方面的激进表现,是

充满启蒙色彩的戊戌变法。与其说是它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向了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在内的现代文学开拓者的文化和历史的视野,不如说是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现代化”的文学概念,从而奠定了现代文学的思想基础。在戊戌变法以及“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的身上,兼有思想启蒙与文学启蒙的双重色彩。可举为用思想启蒙的巨大车轮带动文学启蒙典范的,应推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新民说》和另一篇重要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文学提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高度,将后者置于政治、道德、宗教、人心、风俗和人格变革等社会改革的广阔背景当中,把文学的现代化与社会、民族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应看到,梁启超君主立宪的保守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为后来现代文学的深刻矛盾与危机,留下了隐患。

文学启蒙的工作意味着,人们将要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做出自己的严峻选择。最初力倡文学现代化的,是陈独秀和胡适。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这篇《新青年》杂志实际的发刊词中,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抨击了传统的文化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稍后,他又和胡适分别在《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等文中,以“口语的”、“言之有物的”而非“退隐的”、“山林的”等措辞,对现代与传统的文学观进行了二元对立式的划分,锋芒直接指向“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要求文学从对传统文化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在当时无疑有极重大的意义。如此激烈否定传统、推崇现代性的文学品格,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严格地说,陈、胡的言论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历史工作的继续。这实际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清以降的文学启蒙,已开始由笼统的倡导推进到实际运作的阶段,文学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正逐渐为思虑成熟的文学策略所替代。在以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康有为开始的文学变革和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现代潮流之间,陈独秀和胡适扮演了推波助澜和舆论推动的角色。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知识

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两人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胡适中年以后的“《红楼梦》研究”、“《水经注》研究”,陈独秀在晚年勉力进行的文字学研究,都充分证明了这种传统文化影响的存在。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尽管现代/传统的对立被一部分思想先驱看做了“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①,它的目的是通过对旧传统采取过激的“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②,但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感,不只是来自现代/传统这种对立的关系,而且也来自对文学启蒙本身的深刻怀疑。在激烈的反传统态度中,一开头便明确包含或潜埋着对士大夫固有传统的体认。比如,文学启蒙的目的重在国民性的改造,从而最后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这恰好说明它仍未脱离“以天下为己任”的愤世忧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论中显现了文学启蒙中现代化主题的内在复杂性和现代性。

把文学启蒙思潮中的现代化内涵继续扩充并极大地深化了的,是鲁迅和周作人。虽然他们二人的思路是循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两个方面展开的,但显然这种思考的重心更偏重于后者,即个人的现代化。1907年至1908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和《摩罗诗力说》中,鲜明地流露出希望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态度,但又为之怀着深沉的隐忧:“中国人”会不会被从“世界人”中挤出。^③几乎在此前后,他在论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又以施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个人”学说为哲学背景,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作为通向“人国”的途径,否定了一切外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专制”形式:道德、伦理、国家以及“世界人”和“国民”等类属概念。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对鲁迅的上述思想做出了理论上的呼应。虽然和鲁迅一样,周作人热忱地关注着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但认为,个人精神世界的建设更为迫切和必要。周氏兄弟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国民灵魂的重要命题,极大地突出了中国文学中“个人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使之成为它后来发展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就不难理解,尽管鲁迅始终是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角度思考改造国民灵魂的问题的,但无论在孔乙己、魏连没还是在祥林嫂、阿Q身上,他思考最深、忧愤最广的仍然是个人生存的“危机”。虽然在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一命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4卷,1022—102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

③ 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3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题在演进之中也产生过种种变异,在不同营垒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之间出现过诸多争论,但基本思想却支配并影响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的发展。“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抗战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思潮,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密切联系,文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鲁迅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的文学观,实际不仅在“五四”时期的创造社作家,同时在30年代的革命作家那里也得到自觉的呼应。在创造社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中,包含着对文学的“社会影响”的重视。虽然革命文学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不免有浮夸之辞,某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但它的内核仍保留了改造国民性的色彩,比如张天翼、丁玲、叶紫就把文学启蒙的对象集中于下层社会,把唤起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为文学的基本任务。在30年代,另外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坚持与政治保持有距离的文学观,认为“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②,却不赞成“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他们关于“怡情养性”、赞美“原始人性”以及回归自然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倾向中,依然保持着改造国民灵魂的内涵,同现代文学的基本信念是并行不悖的。以前大多数研究者较多注意到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上的分歧,对他们同样坚持文学启蒙的共同倾向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用现成的政治性结论替代了对复杂文学现象细致的考察和辨析,这就容易游离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启蒙的发展主线,最终陷入认识论的误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过去我们沿用了思想史界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思路,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③,这虽然在文学研究的一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启蒙与救亡本来已经包含了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内蕴,它们是现代化总目标下的基本的张力,却不能说是唯一的矛盾。同样,通过文学本体论排斥文学的文化因素来达到文学研究纯洁化的目的,是另一个今天需要省思的误区。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内涵繁复的概念,现代化本身并不是统一的,其中充斥着矛盾和悖论。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所遵循的是与轮回、循环的历史观念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这种时间观念以现代/传统、新/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3卷,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② 朱光潜:《谈美开场话》,《谈美》,上海,开明书店,1932。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旧甚至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个案,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念为研究的基础,于是在建构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或系统的同时,增加了它本身的历史排斥性的功能,从而将大量的不符合这种时间意识和观念模式的其他文学实践排斥了出去。因为较多考虑自身的文学性而牺牲、省略和放弃了文化研究的复杂性,研究界对1937年以后即现代文学后半期的认识和评价出现分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挫折,抗战爆发严重挫伤了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梦想,同时使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高涨成为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发展中的显著特征。在这一情况下,文学的启蒙对象及其目标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抽象的个人转向具体的社会大众;个人的现代化开始让位于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

第二节 对启蒙的冷静反观

○周氏兄弟精神世界中充满矛盾的两条思路 ○现代化主题的矛盾与张力
○题材的多样化选择 ○文学形式的变革实践

周氏兄弟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复杂即在于,它不只是来自传统/现代的尖锐对立,以及由此引出的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而且也来自对现代本身的深刻怀疑。1927年,鲁迅明确有过他的进化论思路“从此轰毁”^①的表示。其实,他早期和前期的思想中不单存在进化论的思路,同样也存在着反进化论、反现代的思路。以“立人”为核心,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社会自觉和人类历史必然的进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鲁迅“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观,于是有了“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②的明确观点。他曾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的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总要做到。”^③同时,却对启蒙的实际作用充满深刻疑虑:“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④并一再感叹“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寞境哉”。^④以至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②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鲁迅全集》,第11卷,3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③ 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1卷,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④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在晚年,对团体的活动和意义始终怀着很深的不信任感。周作人早先也是思想启蒙界的“凌厉浮躁”的先觉者,将人的觉醒自觉与民族的觉醒联系起来;然而就在“五四”时代,他的《小河》一诗就已透露出一种“古老的忧惧”,从对民众精神解放可能性的怀疑,转换为对自身的“幻灭”,由此发现了思想启蒙这一预设本身的可疑:“现代中国上下的言行,都一行行地写在二十四史的鬼账簿上面。”^①综观他们的思想,可以发现启蒙与反启蒙的两种思路是互相矛盾,同时悖论地并存着的。他们一方面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进化过程,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过程不过是一种“偏至”的过程而已,进化的每一阶段又形成对人的严重压抑;一面说青年胜于老年,显露了乐观的历史信念;另一面则把中国的历史描绘成永无止境的两种奴隶时代的循环相续,从而把历史循环不仅看做一种历史性现象,而且似乎就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人们之所以把鲁迅、周作人称为启蒙思想者,基本根据当然是他们,尤其是鲁迅毕生坚持的“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信念,包括对科学、民主的信念。但是,周氏兄弟思想中与众不同的“个人”概念却使得这一思想追求同时具有反启蒙的特征。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化主题内涵的复杂性,也使人们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变得愈加复杂了;另一方面,现代化命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反观,则进一步突破了狭义文学史的历史框架,使之与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发生了更深刻、密切的联系。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文学形式、文学风格和作家的审美旨趣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主题的矛盾与张力

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传统、个人与西方文化的冲突、阶级冲突等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现代文学对待现代化的态度远不是统一的,主题的呈现往往充满了矛盾,乃至有颇大的差异。如果不把现代文学简单地等同于新文学,而是包括了其他非主流叙事的文学形态,如都市通俗小说、知识分子自我审省小说等等,便会发现,在坚持思想启蒙的主流文学叙事之外,事实上一开始就并行着对启蒙表示怀疑、对现代化怀有深刻不信任的多种叙事态度。拿“五四”时期来说,在以外国文学为蓝本、以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的新文学之外,另一种基本承袭了

^① 周作人:《伟大的捕风》,《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